臺大歷史學報第 46 期
2010 年 12 月，頁 231-238

BIBLID1012-8514(2010)46p.231-238
2010.4.19 收稿，2010.6.30 通過刊登

§書評§

評李松濤，《唐代前期政治文化研究》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9，343 頁。

傅　揚*

唐朝（618-907）歷史經過幾代學者耕耘，業已累積不少重要成果。特別在政治史及相關領域，有陳寅恪（1890-1969）的典範性著作及後學之發揮，要取得重大突破絕非易事。[1]李松濤先生不畏艱難，以「種族」與「文化」兩大要素為線索，撰成《唐代前期政治文化研究》一書，為此時期的歷史與政治文化研究帶來可喜的成果。全書共七章，另含一篇附錄及四個附表。以下先引介各章要旨，再就其學術貢獻和足資討論處略陳己見，以就教於作者與方家。

第一章〈引言〉扼要說明了全書的研究理念與內容架構。本書所謂「唐代前期」，指的是安史之亂（755-763）以前的唐代歷史，「政治文化」的內容則包含政治史、文化史及兩者之關係，故全書是「以歷史學的研究方法，探討『安史亂』前唐代政治史、文化史及其關係」（頁 3）。作者發揮陳寅恪揭櫫之「種族」與「文化」兩大要素，以此析論唐前期社會群體的政治文化關係與河北地域文化特色，為安史之亂的成因增添文化層面的解釋。「種族」與「文化」二概念的涵義非常複雜，在本書中，關於「種族」的討論，集中於隋唐時期胡漢血統之別及其帶來的影響，「文化」的部分則主要著墨於中國本土儒家傳統在中古時期遭遇的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10617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4 段 1 號；E-mail: fuyangrs@yahoo.com.tw。

1 回顧唐代政治史研究的討論頗多，可參考胡戟等主編，《二十世紀唐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政治卷，頁 3-287。關於陳寅恪的唐史研究及其影響，見後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挑戰和發展。

第二章〈北朝後期至隋末唐初的文化潮流〉和第三章〈李唐皇室的文化傾向〉，都著眼於統治階層的種族與文化屬性，申論其內容、表現及影響。作者在第二章認為，種族與文化是北朝後期以來政治文化中最顯著的問題。隋朝（581-618）時天下一統，隋文帝（581-604 在位）和隋煬帝（604-618 在位）都嘗試調合胡漢民族與南北文化的矛盾，而煬帝欣慕南方的文化傾向，則引發當時仍具胡化色彩的諸集團起而抵抗，造成隋的滅亡。在第三章中，作者重申李唐皇室的胡族背景及其影響，認為皇室禮法觀念不強，唐太宗（627-649 在位）夷夏一家之民族政策及唐代女主執政風氣等現象，「表明了外來文化的存在以及當時社會生活廣泛受到胡俗胡風影響的事實」（頁 102），也使當時中原士人缺少對胡族胡風的警覺性，埋下安史之亂的種子。

第四章〈唐代前期的儒學地位〉和第五章〈山東士族高門勢力的消長〉，旨在分析當時政治文化政策對儒學發展與山東士族的影響。作者將山東士族視為儒學的載體，認為朝廷打擊山東士族的同時，也導致儒學發展停滯與缺乏活力。在第四章，作者論證唐太宗頒布《五經正義》的動機，是與山東士族爭奪經學的主導權；政府高層刻意抬高以文學寫作為能與為名的人，則使社會產生「重文學詞章而輕儒學經術的風氣」（頁 129），並最終在玄宗朝培養出一批以文學為重的「文儒」。作者在第五章也認為，唐代明經科使經學成為考試工具，削弱儒學經世意識，政府又推動進士科考試，讓山東士族為求仕途，不得不漸棄其儒學教育的傳統。受到這些政策的打擊，再加上為應舉而遷徙離開原居地等情況影響，山東士族的政治與文化地位大不如前，造成安史之亂醞釀與爆發之際，華北社會「傳統文化相對低落，外來文化勢力高漲的局面」（頁 190）。

隨後兩章將討論重心放在爆發安史之亂的河北地區。第六章〈河北北部安史武裝集團的形成〉從河北地區的特殊性出發，論證安祿山集團勢力形成的根源。作者先爬梳史料，還原 696 年契丹李盡忠、孫萬榮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亂，指出此動亂使唐朝加強建設幽州和營州（皆於今河北境內），而這番經營則為安祿山叛亂提供了良好的政治與軍事條件。接著他描繪河北軍事邊區五州（幽、媯、檀、薊、平）的地域文化特色，及該地烏羅護族人與安史集團之關係，認為河北北部居民普遍尚武並深染胡風，安史之亂爆發於此，有其深刻的社會文化背景。在第七章〈「安史亂」前中央政府與華北社會之關係〉中，作者運用以色列學者 Shmuel Eisenstadt（1923-2010）的社會學理論，分別以唐太宗時議行封建的問題與武則天、唐睿宗時茁壯的幽州節度使為個案，論證唐朝政府如何吸納、應對華北地區的社會群體及人力資源。作者最終指出：中央政府仰賴幽州節度使處理東北事務，又大量吸收當地內附蕃人進入帝國政治體系的做法，雖成功確保東北穩定，卻形成中央與邊境間「文、武殊途的政治文化傾向」（頁 259），而這一政治結構最終也成為觸發安史之亂的扳機。

本書另有一份附錄與四篇附表。附錄為〈安祿山（史思明）年譜〉，旨在編年重建安祿山的活動蹤跡，並呈現與其相關的唐朝重要政治事件。附表一根據《隋書．儒林傳》與新舊《唐書》的〈儒學傳〉，整理隋代至唐玄宗時期的儒臣資料，包含郡望、著述和學術授受關係等內容。附表二依據新舊《唐書》的〈地理志〉，整理安史亂前營州、幽州境內存在的羈縻州資料，並於有疑義處進行考辨。附表三據史籍列舉安史之亂前幽州境內的蕃將，特別指陳他們與安史集團的關係。附表四為安史亂前（583-755）幽州和營州的大事年表，具體內容可與附錄〈安祿山（史思明）年譜〉互相參證。

由以上引介可知，全書各篇主題相互獨立，但彼此間亦存在有機的聯繫。作者在多方掌握隋唐史料的基礎上，以「種族」和「文化」概念為分析範疇，貫串國家政策、政治事件、社會群體與地方風俗文化等諸多課題，在具體見解與宏觀思考上都有可觀處。綜觀各篇，筆者認為本書有三項最重要的學術貢獻。

首先，作者能運用問題意識鮮明的分析框架來解讀唐代前期的政治與社會史，為這一領域的研究增添更深刻的理解。如筆者一再指出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全書最重要的分析工具是種族與文化的概念。作者自承種族和文化的概念其實來自陳寅恪的研究，但這並不表示本書的學術創見因此有所減低。事實剛好相反：本書對陳寅恪見解的充分發揮，正說明了作者能珍視前人成果並將之運用於深入研究的眼光。在唐代政治史的研究中，陳寅恪至少提出了關隴集團學說與種族文化觀兩個具理論化傾向的概念。關隴集團理論帶給後繼研究者巨大影響，沿用與修正者皆有之。[2]相較之下，陳氏的種族文化觀在後來的唐史研究中並未被真正重視，儘管有學者從理論方面闡釋之，實際將其深入運用於具體研究者卻相當少。[3]作者在對唐代政治、社會、文化面貌的理解上，選擇陳寅恪的種族文化觀來統攝史料、分析問題，並透過實際成果證明陳寅恪的看法，確有其獨到之處。從這一角度來說，全書除提出具體見解外，其問題意識還具有學術史的意義，值得重視。

在處理問題的方法上，作者最值得稱道的是將關於文化的討論引入不同課題中，並從而提出許多觀察。例如第二章關於隋末動亂，過去多數研究的重點在解析隋末群雄的政治與社會屬性，[4]作者則基於隋煬帝傾慕南方文化而引發騷亂的現象，明確指出隋末動亂群體的胡化傾向，值得參考。又如第四章析論唐朝皇室如何在學術文化上打擊山東高門時，作者指出當時知識群體區分為儒者與文人的現象，認為這反映了當時政治文化的趨向，其立論與論證深度皆為過去研究者所不及，亦值重視。關於此類貢獻，全書尚有不少，請讀者自行閱覽。必須指出的是，作者

2 解析陳寅恪關隴集團理論的作品不在少數，能結合此見解與具體研究而提出修正者，可參考黃永年，《六至九世紀中國政治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第 2 章〈關隴集團始末〉，頁 40-76。毛漢光，《中國中古政治史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

3 關於陳寅恪種族文化觀之內涵，可參考彭華，〈陳寅恪「種族與文化」觀辨微〉，《歷史研究》2000 年第 1 期（北京），頁 186-188；林悟殊，〈陳寅恪先生「胡化」、「漢化」說的啟示〉，《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 年第 1 期（廣州），頁 42-47。

4 代表性論著，除作者徵引的陳寅恪，〈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傑」〉，收入氏著，《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 243-265；亦可參考〔日〕布目潮渢，《隋唐史研究：唐朝政權の形成》（東京：東洋史研究會，1968），上篇「唐朝政權の源流として見た隋末の叛亂」，頁 17-14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從文化視角討論政治與社會史的做法，呼應了本書「政治文化研究」的取徑。然而，作者雖屢屢在具體問題上提出重要見解，對於何謂「政治文化」及「政治文化」究竟應如何研究，卻缺乏嚴謹清晰的說明。事實上，這些缺失也見於提倡政治文化研究的一些學術社群。[5]當然，研究取徑的過度理論化或規範化未必有助於實際研究，但無論如何，關於「政治文化」概念的相關問題應當值得學者進一步思考。

第六、第七章對河北地區政治與社會文化問題的討論，也具有相當的學術價值。地域社會是宋元以降中國史研究中的重要課題，但由於缺乏史料，宋以前的社會與文化史在地域研究上所能取得的成果十分有限。作者扣緊唐代河北地區處於民族與文化交匯位置的重要性，廣泛運用文獻、墓誌及其他考古材料，成功刻劃了此地區的特殊面貌，可為有意於地域研究者參考。另一方面，作者著意的雖為安史亂前的河北社會，但從更長遠的視角來觀察，河北地區種族與文化的特色左右著數百年中國歷史的發展，直至唐末五代仍具有影響力。由此而論，本書不僅對研治唐代前期歷史者有所貢獻，對思考唐末五代變化、唐宋變革論題的學者，這兩章也是應該參考的佳作。

本書的出發點是探討作為安史之亂背景的唐前期政治文化，故我們理應考慮作者的論述是否能解答此一關懷。作者以種族與文化的視角定位安史之亂，視之為胡族與非漢文化和華夏中國文化衝突的結果，輔以政治與地域研究的具體成果，認為安史之亂爆發於河北並非偶然。按本書的推論，諸如夷夏意識淡薄、儒學不振、任用蕃將處理邊事、河北累積了強大的軍事力量、中央與河北人才流通遭到阻絕等，這些要素互相關連並促成安史之亂的必然性。這是作者的一家之言，論者可以提出證據來支持或反對；筆者對這種必然性有所保留，但同意李松濤許多見解，

5 相關討論最初見諸對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臺北：允晨文化，2003）一書的反饋，後來這一概念被重視且運用於其他研究中，取得不少成果。此一學術脈絡，可參考鄧小南等，〈歷史學視野中的政治文化〉，《讀書》2005 年第 10 期（北京），頁 116-132；陳蘇鎮主編，《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亦認為此研究取徑頗有啟發性，能幫助我們更深入理解相關議題。

再進一步說，也許我們應該思考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本書的問題意識是解答安史之亂爆發的背景，然而另一同樣重要的問題是：為什麼要強調「安史之亂」？乍看之下，這一提問似乎貽笑大方，畢竟安史之亂左右唐朝歷史發展的重要性人盡皆知。但為什麼這場 755 年的動亂會造成如此深刻的影響？為什麼沉重打擊唐朝政府的軍事行動不是爆發於其他地區或以其他類型出現？平心而論，安史之亂雖然有無可迴避的重要性，我們對它的瞭解，卻多半停留在常識與想當然耳的層次。目前對安史之亂最全面的研究，仍屬蒲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 一書。[6]但該書出版至今已四十多年，其分析與深度亦難滿足現在的學者，學界亟須盡速從不同視角對安史之亂性質等相關課題進行研究。[7]從這一角度來看，無論本書能否就安史之亂的成因說服所有讀者，作者關於唐代前期政治、社會與文化的討論，正是解明安史之亂性質的重要鑰匙，值得稱許。

除正面的貢獻外，全書在兩個方面表現出較明顯的不足。首先，本書頗為成功地運用了富啟發性的分析框架，但在「種族」和「文化」範疇的影響下，作者有時不免過於簡化所討論的問題。如作者分析唐朝皇室與山東士族之關係時，將山東士族作為中國傳統文化和儒家思想觀念的承載者，打壓他們的唐朝皇室則成為胡族和非漢文化的代表，以此推論唐朝前期的儒學受政策所迫而趨向衰微。此種看法固有其精彩處，但過於簡單地將種族、文化、社會群體等要素連結起來，忽略其中的複雜關係，易錯過許多重要的歷史訊息。即如此處討論的唐代前期儒學問題，便有學者指出儒學思想其實深刻影響了初唐的政治理念與政策，明顯與

6 Edwin G. Pulleyblank,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7 黃約瑟（1953-1994）早在 1992 年便指出，學界十分缺乏對安史之亂的研究，但這一呼籲至今仍未得到積極迴響，見黃約瑟，〈近年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顧與反思〉，《新史學》第 3 卷第 3 期（1992，臺北），頁 16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作者所論有所扞格。[8]除此之外，「種族」的因素也不單純。史料中固然常透露出區別華夷或胡漢的意識，但對種族問題的思考，也許不能簡單地用血緣加以區分，也不應直接地認為某種族屬性會導致某種文化傾向。除了血緣與文化表現外，在實際面對種族問題時，不同立場的人往往出於不同意圖，利用各種元素來滿足其關於種族的論述。這一點應該是討論種族與文化屬性時當注意到的深層問題，可惜作者對此未做更深入的剖析。[9]

另一方面，全書由相對獨立的章節連綴而成，作者所選取的主題固然關鍵，但也多少遺漏部分從政治文化取徑或「種族／文化」視角觀之頗為重要的課題。最顯著的遺珠之憾，也許是沒有處理到佛教在初唐政治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問題。佛教與中國皇權的關係，既涉及政治史處理的實際政治人事課題，也包含不同價值體系關係的文化史討論，非常符合作者對政治文化研究的關懷。隋代兩個皇帝都禮敬佛教，而隋朝享祚不過短短的三十多年，初唐君臣熟知隋代對佛教的重視，又親歷前朝速亡的巨大衝擊，這對他們如何思考佛教在政治中的角色，有不容小覷的影響力，是政治文化研究的絕佳題材。除此之外，佛教既是與儒家相對立的文化價值體系，又是傳自域外的夷人之教，這一雙重性質使種族和文化的分析範疇非常適用於討論佛教，將當時有關佛教的諸般言論作為例證，觀察唐代前期的人對種族與文化要素的思考，應該是很有意義的嘗試。但關於佛教的討論，在本書中幾乎付之闕如，相當可惜。[10]

8 如 Howard J. Wechsler, “The Confucian Impact on Early T’ang Decision-Making,” *T’oung Pao*, Second Series, Vol. 66, Livr. 1/3 (1980, Leiden), pp. 1-40; 羅彤華，《貞觀之治與儒家思想》（臺北：國立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4）。

9 關於唐代種族、民族論述的綜合研究，可參考 Marc S. Abramson, *Ethnic Identity in Tang Chin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10 佛教與王權力量的拉鋸，是中國史一個重要課題，關於唐代佛教與政治權力的互動關係，扼要的描述可見 Stanley Weinstein, *Buddhism Under the T’a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佛教是夷人之教的想法由來已久，這點也是中國士人排拒佛教的一個重要理由，相關研究請參考〔日〕吉川忠夫，《六朝精神史研究》（東京：同朋舍，1984），第 12、13、14 章，頁 462-546。〔日〕中嶋隆藏，《六朝思想の研究：士大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最後應指出的是，全書有〈引言〉而無結論，影響到結構以至整體貢獻，頗有憾焉。前文已提到全書各章可以單獨成篇，可見每章自有其理路，頭緒不可謂不多。作者於〈引言〉中固然做到了陳述其問題意識、簡述諸篇論旨，以及提點各章的關聯性，但經過數章的論述，全書的主軸其實已有些模糊。無論從讀者立場出發，或考慮到著作的結構，作者若能撰寫結論總結各章重點，提出貫串全書的見解或解釋，內容將更加完整。尤有甚者，由於缺乏結論的舞臺，作者無法凝聚各篇的研究心得，提出關於唐代前期政治文化及其與安史之亂關係的整體解釋。某種程度上而言，這一缺憾讓作者許多研究成果流於個案討論和證成舊說（特別是陳寅恪的學說），減損了全書的整體貢獻，應該予以補正。

《唐代前期政治文化研究》立基於史料考辨，結合當前學界重視的政治文化取徑與陳寅恪的種族文化觀點，鮮明地重繪安史之亂前政治、社會與文化互動的面貌。即使有若干可再商榷之處，作為解析唐代前期政治史、文化史面貌的專著，本書毫無疑問有其堅實和富啟發性的貢獻。本文難以道盡全書精彩處與待發之覆，尚祈唐史研究者和關心政治文化史的學者細心參酌之。

（責任編輯：韓承樺　校對：劉牧菁　李志鴻）

と佛教思想》（京都：平樂寺，1985），頁 234-26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